

内部发行，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 研讨实录

第 78 期

78

TPP 协议签订后的挑战和应对措施

蔡霞：和平推进中国的政治转型何以可能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  
Shanghai Development Research Foundation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龙华东路868号办公楼A楼2201室 Address : Rm.2201, Office Building A, 868 Longhua East Road, Shanghai, China  
邮编：200023 ZipCode : 200023  
电话：86-21-62188752 Tel : 86-21-62188752  
传真：86-21-62188714 Fax : 86-21-62188714  
网址：www.sdrf.org.cn WebSite : www.sdrf.org.cn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编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

## 序 言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于 1993 年成立，以积极推进经济、社会、城市发展决策咨询事业为宗旨；以募集、运作资金，研究、交流、资助、奖励有关经济、社会、城市发展决策咨询项目为业务范围。

2005 年以来，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在业务开展方面进行了更多有益探索，推出了每月的“上海发展沙龙”主题活动，与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合作，邀请国内外知名的学者、专家和实业界人士进行演讲，与听众进行交流。时至今日，沙龙已经活动了 90 多次，成为了基金会有一个品牌。

从 2007 年开始，基金会在每年的年中举办“世界和中国经济论坛”，重点分析全球经济对中国的影响；在每年的年末举办“中国经济论坛”，着重分析当年的经济形势，展望来年的经济走势。

2009 年和 2010 年，基金会又分别召开了“中国经济：未来三十年”、“中国的城市化：目标、路径和政策”国际研讨会，邀请了海内外著名学者、经济学家、投资者、金融和商界人士，围绕相关问题进行了研讨。

基金会从 2009 年开始至今，与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合作，每年连续合办“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城市化”专题圆桌讨论会，针对城市化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基金会也将知名专家和基金会自身的部分研究成果编撰成书，“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丛书”已出版了《中国经济：未来三十年》、《中国的城市化：目标、路径和政策》、《新型城市化：抉择和路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我们希望能够将有价值的见解与朋友们分享，因此把沙龙和研讨会的一些精彩内容陆续编辑成册，称为“研讨实录”，不定期的发行，旨在将这些活动的互动过程尽量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来。希望各位朋友能够给我们提出更多更好的建议，以使基金会能够更上层楼！

是为序。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会会长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reading '胡旭照' (Hu Xizhao).

## 编者的话

本期《研讨实录》收录了基金会最近二次学术活动的实录，分别为基金会举办的第 12 期系列座谈会“TPP 协议签订后的挑战和应对措施”，第 110 期沙龙蔡霞教授关于“和平推进政治转型”的演讲。

在关于 TPP 的座谈会上，上海 WTO 事务咨询中心业务总监冯军、申万宏源研究所首席宏观分析师李慧勇、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特约研究员沈明、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员肖明智等参与讨论，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乔依德主持。与会专家围绕 TPP 的三个问题展开讨论，即：TPP 协议签订后对中国经济贸易的影响、中国如何化解这些不利因素、具体的政策建议和措施。专家们较为一致的观点是：要面对现实，要准备 TPP 在 2016 年就生效。贸易转移和投资转移不是在 TPP 正式生效时才来的，早就开始转移了，TPP 的生效是加大贸易和投资转移。TPP 实际上倒逼我们的改革。本来我们觉得改革的时间表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但其实不完全如此，要看世界大势，要看国际经贸规则。

在沙龙上，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蔡霞教授作了题为“和平推进政治转型何以可能——由中国与西班牙比较所想到

的”的演讲。蔡霞教授认为，把中国几十年来的变化放到一个大的背景中去看，中国社会其实处在一个文明转型的过程当中。一个社会的文明转型是全方位的，起步一定是经济，然后社会结构发生很大的改变，人们的思想文化观念发生很大的变化。再下来就是政治运作的机制、制度环境必须要跟着改变。

更为详细的精彩内容，请大家阅读本期《研讨实录》。

乔依德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 目 录

TPP 协议签订后的挑战和应对措施.....	1
蔡霞：和平推进中国的政治转型何以可能.....	27



## TPP 协议签订后的挑战和应对措施

### 系列座谈会 2015 年第 12 期

2015 年 10 月 13 日

**乔依德**（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我们就开始了。肖明智也是我们基金会的，他两年前跟马骏写过一篇关于 TPP 的文章。文章出来时，国庆还没有过完，反响也比较大，特别是在民间，当然，在谈的过程中，有些地方也不是很准确。现在关于 TPP 有两种说法，一个是觉得中国完全被排斥在外面了；另外一个引用了很多美国政要的话，说这不是针对中国的，也没有什么影响。《解放日报》说，我们已经下了先手棋了。这个说法也是有毛病的，先手棋是人家还没动，你比人家动得早。这次请大家来，我们从各个方面谈谈 TPP。你们很多人对这个事情比较关注，特别是专门搞研究，搞 WTO 的。最近我看到有一篇文章，反响很大，说国内对这个问题没有什么研究。其实并不是这样，研究还是很多的。这次请你们来，第一是谈谈对这个问题的总判断，就是怎么看这个事情？第二，这对我们有什么影响？我们应该采取什么立场和态度来看待这个事情？

**冯军**（上海 WTO 事务咨询中心业务总监）：我觉得，TPP 其实是 WTO+，它增加了很多的新的贸易投资的规则，30 章。现在大部分人在讲，要看文本。文本确实没出来，细节还没出来。但是我觉得其实细节一直在，很具体的。比如说，我们平时和美国商会、欧盟商会在各种场合谈的，他们跨国公司的观点实际上都能反映出来了。美国和韩国的

FTA 文本，2012 年 3 月 15 日生效的，最新的，尽管只有 24 章，但是核心内容都在。这次公布的摘要 30 章，实际上都点到了这些东西，我现在正在核对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可以说基本上只有增加，没有减少。从总体上来说，尽管中央 60 条深化改革的文件提到了改革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但真正落实到 FTA 和部门的改革，我们能感受到的就是自贸区，自贸区也是在有限的范围内。因为我们的主流媒体基本上是跟着文件走的，给我们每天有创新的感觉，海关的创新、贸易便利化的创新，天天就跟你讲多少条创新。但外商认为，在上海没有什么明显的机会。开放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贸易便利化有一些，实际上就是通关便利化，单一窗口也是相对有些。为了显示我们改革开放创新，宣传力度都比较大，感觉上很热闹，但实质意义、效果并不是那么大。所以到今年已经两年了，你去看自贸区，没有什么大的方面，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一直讲，你总会讲完的。然后到 10 月 5 日，大家根本都不相信，连我自己也不相信，TPP 谈成了，好像一个靴子真的落地了。我马上去看，那时候有声明，摘要还没有出来，然后就等，最后说日本人报道了，什么地方报道了。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没有有效地了解 TPP 的谈判进程，当然有关部门可能会知道，这会 misleading（引入歧途）我们很多的部门，我们其实应该反思。我觉得，关于第二个靴子，也就是正式生效这事，就不要再继续这个模式了，说什么难以通过之类的，现在你可以看到很多的文章这么说。可能还会有时间，但是我们要未雨绸缪，一定要早做准备。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刚才已经提到了，摘要的 30 章和美韩 FTA 的 24 章，中韩的实际上就 22 章。我们有些东西在自贸区谈

---

判里实际上没有放进去。中韩的 22 章里，有些东西是没有的。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像 GPA 采购（政府采购协议）我们是没的，劳工肯定也没有的。而且，有些东西我们虚化很厉害。我花了比较大功夫研究电子商务，李克强总理一直强调我们要搞“互联网+”。我就举个简单例子。我们上海也很希望发展互联网，美国人整合的是什么互联网呢？电子商务大家都没有定义，中国、美国、韩国都没有下过定义，但它们有数字产品 Digital Product 这个概念，所有数字产品的 cross-border 贸易全部零关税，这是有实质内容的。在中韩协议里，我们没有数字产品的概念，因为我们的数字产品根本不强大，我们是进口方，我们的产业肯定是不同意的。我们用了一个电子传输零关税，就是在网上传输的东西零关税，这本来就根本不可能征到税的，就是说你是自己在逗自己玩。韩国人也没有办法，你说电子传输零关税就零关税吧。这是一个例子。

在中韩协议里，有九条是关于电子商务的，中国基本上让电子商务这一部分的整个法律制度没有用，或者说得客气点，是虚化。举个例子，第一条是一般条款。第二条是与其他章节的关系，明确规定其他章节若与这一章的内容不一样的，全部以其他章节为主，就是说，这一章是不算数的。第三条是海关关税，就是网上的电子传输都不征税，这三条没有什么内容了。比较有内容的是 4、5、6、8 这四条，讲什么呢？讲电子认证和签名。第八条下定义，电子认证、电子签名是什么。第五条是个人信息保护，第六条是无纸贸易。如果你具体看，实际上也是没有内容的。它就是说，电子认证应该算数的，电子签名应该算数的，大家商量一套标准等等。最后一条说，争端解决不适用，电子商务里出现争端是

不适用的，就是没有什么争端。里面所有的法律都是意思意思的。这是中韩的，中澳也是这样，类似的。这也是以小见大。

这次 TPP 的 30 章里，还有一个比较厉害的，金融服务贸易是有负面清单的。美国现在已经生效的有 14 个 FTA，是和 20 个国家签的。其中，在北美洲和拉丁美洲有 13 个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在 TPP 之前，长期以来美国的中心是集中在美洲的。在美洲以外，亚太签的不多，美国与以色列是最早签的。21 世纪以后美国才逐步开始和亚洲一些国家签。总的来说，现在这个 TPP 是大手笔了。而且我们发现有一个大的问题，美国是和 11 个国家签的 TPP，它可能呈现了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叫雁行模式，美国领头肯定没有问题的。日本其实也是在东亚的雁行模式中领头的。其他的都是在后面的，有秘鲁、智利，包括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甚至包括加拿大和墨西哥。我们现在的开放度和规则还是和 TPP 有差距的。

现在我们看摘要，大部分内容都在里面，核心内容都点到了，然后就是细节了。像电子商务，实际上在美韩的电子商务里，比较大的方面，TPP 里都提到了，包括服务器不必设在所在地（“不以在当地设立数据中心为条件，也无须提交或开放软件源代码”），包括数据要自由流动的，数字产品贸易要享受国民待遇等等。数字产品在美韩里面是用比较包容性的概念，比如电脑是数字产品，它有物理介质的，也有程序的，都是数字产品，没有严格定义，就用了一个包括性的概念。这样可能会很多。所有的医疗仪器可能都是数字产品，现在的医疗仪器不靠电脑怎么玩，CP、核磁共振都是数字产品，都要零关税。另外有一个叫信息产品扩围谈判，

---

已经签了，这里面大部分是数字产品。这些产品都代表了跨国公司的强势产品，欧美国家主导的规则是要零关税，不发达国家肯定不愿意。

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我们到底放还是不放？放了我们肯定要受很大的冲击，但是如果不放，其实这个技术也拿不到。我们多少年来一直想用市场换技术，现在证明这个路实际上是走不通的。汽车也好，高精尖技术也好，跨国公司不会把它吃饭的饭碗都给你的。他的技术都给你，然后让他走人滚蛋，我们的司马昭之心，太难做到了。我要是跨国公司我也不肯，我把技术都给你，我怎么弄？当然，有些东西像劳工，可能跨国公司愿意中国政府的工会存在，有时候可以协调很多的事情。像美国的劳联产联，他们也是很晕的。

货物贸易的话，负面清单列出来就很清楚，哪些是限制、禁止的，或者是以后可能禁止的，其他都是开放的，这个范围就很大。我们可能一时半会没有相应的法律和规定。就像金砖银行在上海，他们开了一个单子，出现什么情况呢？全部都要免税，但是我们现在没有这个法律的。到我们这里落户的第一个国际组织，你总归要有配套的法律法规来处理。这是我讲的 TPP 具体的方面，因为它有 30 章，绝对不是泛泛而谈的一个大的东西。有人写文章，说 TPP 的电子商务和我们的电子商务差不多，区别不大。我说，这是根本性的差别，你讲的是电子传输，而它的数字产品是有实质内容的，这是根本性的。还有一个根本性的是数据的自由流动，对于数据的自由流动，我们网络现在的这种限制是万万不可能放开的。所以在这个里面，我觉得也是不现实的。在美国有关电子商务的章节里都有这个规定，它签的法律文本都找得到，如果正式公布 TPP 文本，一定会有的。现在大

家都说要看最后文本，但我觉得这都是可以预计到的。

**乔依德:** 我插一句，如果是这样的话，越南能得到吗？

**冯军:** 所以有一个过渡期。我们没有看到关于越南的具体条件，包括越南的劳工、纺织等等，包括货物，都会有具体的条件，不同的国家还是有的，否则谈老半天干嘛，应该有缓冲期。第二个，我们中国是在 2001 年加入 WTO 的，越南政府代表团从北京一直跑到上海，到我们中心过来学习，很认真的，学习怎么加入。现在我们要向越南学习怎么加入 TPP 了。越南怎么能完成这个目标，符合这个标准？这对越南应该是挑战很大的。美国一个统一标准，越南现在已经签了，它肯定也是要改规则的，它下决心上这条船了，就绑在美国人船上了。越南应该是一个政治决定，从这个角度来讲，越南的很多产品，越南 9000 多万人，大量的劳动力密集产品、贸易转移的产品、投资转移的产品都可以在越南生根，这对越南确实会有很大的机会。可能它就是看到当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和 WTO，它现在一咬牙，过程会比较痛苦，凤凰涅槃后，它可能会上一个台阶。肯定对它会有冲击，开放一定会有冲击的。TPP 要一章一章谈，才会有具体内容。

**乔依德:** 现在用不着看具体的文本，大致也清楚了。就算不谈大的方面，对我们来说，会有哪些影响？或者说下一步我们应该怎么做？

**冯军:** 第一，我们要面对现实。就是你要准备 TPP 在 2016 年就生效。贸易投资转移的影响现在很难说具体有多大，但是有一点我可以明确告诉你，贸易转移和投资转移不是 TPP 签的时候才来的，早就转移了。现在我们还不停地看到东莞、长三角的厂在关，其实我们国内的纺织、钢

---

铁企业，在菲律宾（尽管它不是 TPP 国家）、越南等东南亚地区，劳动力成本低，它们就会过去，这种转移是渐进的，并不是说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TPP 的生效是加大贸易和投资转移。怎么办呢？我和美国商会、德国商会有比较多的联系，德国企业有不少化工，巴斯夫、拜耳在中国总部的人和全球总部最高层也在不停地博弈一件事情：是不是继续维持在这边的投资，扩大或者减少，他们在动脑筋是不是可以继续维持下去。这就回到了老乔讲的怎么办的问题。其实是你的投资环境，你是继续能让一个局部继续维持？小的局部加起来就是你的一个整体。纺织业在上海维持下去基本是不现实了。我们说腾笼换鸟，但对于高技术，你是不是有足够的创新环境、交易环境能够吸引它，这是最最重要的。如果说我们谈的东西不能落实，就像我们法律做具体业务，一定是 CASEBYCASE。比如在上海买房子，如果租金都很高的话，买房子的人是越来越多；如果租金越来越低，肯定是相反的方向。同样的道理，不管是化工还是什么，我们市场还是很大，但是很多企业可能是在逐步撤。这其实对我们的监管部门或管理部门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乔先生讲的还是一个太大的命题。实际上对于互联网企业、医疗企业，不同监管部门的管理所形成的投资环境是很具体、很细化的，落实到每个不同的地方有大环境，有小环境。我们现在往往争来争去，上海很多企业被黄奇帆拉过去，或者被东南沿海拉过去的，黄奇帆无非是搞一些回扣或者减税，没有改变大的环境。大的投资环境首先是国家的。我们大的战略讲得比较多，但是落实到细节不多。在自贸区这里，2013 年开始的自贸区，看上去动作很大，我觉得自贸区可能是一个局部的区，我们还需要在一个部门行业有大

的改革。我们现在比较强调的是国企。我扯开一点，国企在 TPP 里很明显要竞争中立，而我们根本就觉得竞争可以不中立。国企在资源的各种配置上肯定是优先的，这种竞争不中立导致的对其他市场主体的影响，包括对外国主体的影响，应该不是那么一句话能讲得清楚的。实际上，其他主体会觉得在这个市场上，它一直面临着一种不公平竞争，这会有一个很大的负面影响。

**乔依德:**我觉得很好，有什么负面影响？如果你要和别人玩，你就得改，你不改，就被别人排除在外。其他事情我不好说，这个本来就不应该嘛，你国有企业为什么要比别人特别？

**冯军:**实际上现在就是倒逼我们改革。本来我们觉得改革时间表的节奏是我决定的，但有的东西不是完全由你说了算的，你要看世界大势，你要看国际经贸规则。我们加入 WTO，往往不太从正面说我们有很多的收益，我们有意无意说我们在 WTO 一直被发达国家欺负、歧视啊，但实际上有这么大的收益。举个例子，2001 年我们的外汇储备是 2 千亿，这些年要将近 4 万亿的时候，我们还不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其实应该承认这个东西。

**乔依德:**领导是承认的，但社会上有各种思潮不想承认。

**冯军:**我相信领导是心里有数的，我们加入 WTO 是一个政治决策，所以我们下一步的改革也是一个政治决策。我们首先要加大开放力度，但是也不要因为 TPP 一下子签订了，你就很着急，还是要分部门分地区，逐步逐步地进行。上海一直讲金融中心，中央如果在金融政策上一直很限制的话，自贸区其实和金融关系不大的，和服务贸易关系也不

---

大。这个话说得很不好听，我跟新华社记者也这么说，他听了就笑了。我说，很多事情都是以自贸区的名义改革，但是很多东西不是在自贸区里可以完成交易的。很多服务是没有海关的关卡的，根本不是海关意义上的改革。大家都说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大宗商品定价中心，这更多是市场驱动的，不是造一个楼就变成大宗交易中心了。现在甚至一个地级市也说要变成一个大宗商品交易中心，这样行政驱动的话，往往欲速则不达。包括一带一路都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我的话讲完了。

**乔依德：**我们先简单有个发言，然后大家再讨论好了。

**张平（要求不具名）：**谢谢乔依德。我正好在写一篇东西，来这里听听大家意见，就不要具名了。冯老师讲得比较具体，我只能谈点比较虚的，就是如何应对 TPP 的建议。可以肯定的是，TPP 的签订意味着一个新的贸易投资协定的开始，这无疑对我们未来的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产生一些新的问题和挑战，这是一个客观的现实。我从几个层面提一些应对的办法和建议。

首先，从国家层面应该客观定调 TPP。媒体出的那些言论有一部分是布置下来的，有一部分采访是定点定人定口径的，这是不科学的。从国家层面怎么客观定调 TPP，我们看到商务部和财政部还是持比较积极的、开放的态度。应该看到，TPP 虽然具有针对中国崛起的意图，作为美国重返亚太的经济支柱，但是它很难形成对中国的有效遏制。正如刚才冯老师说的，现在已经可以看到的一些协议的文本，以及将来对我们的一些关键领域、敏感领域产生的影响。但它是否可以有效遏制我们的发展势头？从目前来看，也不尽然。相反，TPP 的规则和制度建设，如果我们应用得当，可以进一

步加快我们的改革，成为释放红利的新动力。现在 TPP 一共是 30 章，它为我们下一步改革创新提供了非常具体的现实版的参考标准。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它比我们先进，你不能批判先进的东西。在制度建设上，我们是落后的。现在我们搞了一带一路，讲一带一路的五通，贸易通、政策通、金融通、基础设施通、民心通，说到底，其实是要制度通，但我们没有制度。我们现在的一带一路靠双边，实际上这些事情我们以前就做了，现在只不过把它放在一带一路的篮子里，如果不跟上 TPP 治理全球化的制度建设，一定是一个烂尾工程。这是一个现实性的参考标准，为我们改革创新提供一个借鉴和依据。

所以目前在国内的四个自贸区内，就按照大胆地试，甚至走得快一点。在 TPP 里，尤其是对于环境、电子商务方面的一些新规定，我们应该大胆试水。TPP 的高标准代表了未来发展趋势，美欧也在推进 TTIP，当然欧洲的阻力大一点。TPP 已经在全球另立了一个 WTO 升级版的全球化的贸易体系，你早晚要加入的。所以在 TPP 文本公布以后，我们要就其涉及的重点部门领域，特别是国企改革、劳动和环境方面，进行系统性评估和分析，在此基础上制订我们的部门应对方案和时间表。别人可以不让你参加，但是你自己不能没有时间表。我的底线在哪里？我有什么样的进度？或者我要申请过渡期，像越南那样。现在越南改革开放的步伐比我们快，某些方面走在我们前面。

第二，就是在地区层面。因为有 APEC，去年北京峰会我们提出推进 FTAAP（亚太自由贸易区），但美国人劲头不大。今年 APEC 又要开了，我们怎么借这个场合对 TPP 有所回应，这是可以提一些建议的。我觉得，北京峰会通过

---

了实现 FTAAP 的北京路线图，可以通过 APEC 这个多边平台，至少形成一种舆论，就是以 FTAAP 建设为远期目标，将 TPP 和 APEC 的贸易投资化进程相结合，至少展示我们合作的姿态，给美国开放 TPP 一个压力。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也在升级，这些都是在 APEC 框架下。所以下一步怎么重点推进和中日韩的自贸区谈判可能是重点。有一个难题就是下一步谈判的出口在哪里？我们的意见，现在难点不是经济，是政治，就是中日关系。近日中日关系可能会有积极的破冰的东西出来，要看外交部怎么推进这件事了。如果中日关系持续紧张，对中日韩的自贸区谈判都是不利的。能不能在 APEC 框架下，再兼顾亚太地区成员国多样化发展阶段，形成以 TPP 和 RCEP 为基础机制，在互补和良性的互动中推进建设亚太自贸区。它是一个远期目标，也可能实现不了，但至少我们有这样一个饼在那里，让大家往那里拱，同时使中国和美国有一个积极的接触。

第三个，从双边层面，我们能做什么。TPP 代表美国主导的多边机制框架安排，我们不擅长。我们拜访了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他们告诉我们，亚投行成立的所有的文件基本上是借过来的。所以我们得承认我们在制度建设上不行，但是我们也有擅长的，我们擅长搞双边。现在 TPP 里面 12 个成员国里有 8 个成员国与我们有自由贸易安排，虽然可能开放程度没有这么高，有新西兰、澳大利亚、智利、秘鲁，另外马来西亚、文莱、越南和新加坡都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框架里，升级版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可能也会提高。现在就是美国、日本、加拿大、墨西哥和我们没有自由贸易的安排。我们和加拿大在谈，和美国谈双边的 BIT，对双边 BIT 我们也不能抱有幻想，TPP 谈不成，BIT 不可能谈成，TPP

谈成了，BIT 也能很快地谈成。在 TPP 签署以后，怎么样有策略地、稳步地继续推进双边谈判，然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冲销 TPP 短中期和短期内对我们的贸易转移和投资带来的负面效应。我们也不能急，不能让美国觉得我们很着急，马上要签 BIT，其实也没有必要。我们在既有的双边优势基础上，把该做的做好，用双边来化解它的多边。韩国现在没有加入 TPP 谈判，韩国在文本公布之后会有一个总体的评估。还有中日韩三边的，我们可以做一些工作，小多边的和双边的可以做一些工作。

第四，就是在全球层面。明年我们是 G20 主席国，G20 历来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倡导在 WTO 的贸易框架下，推进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我们提议，明年将 G20 部长会议机制化。所有的国际社会成员都不希望有一个新的像联合国一样的大机构出来，用很多纳税人的钱。贸易部长会议机制化，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 G20 论坛机制化，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同时又可以推进全球多边贸易谈判进程。

**乔依德：**现在它是财政部和央行是一个机制，它有时候是开会的。

**张平：**为什么我们把 TPP 和 WTO 搞在一起？因为 WTO 成员国多，发展中国家多，如果和美国要价的话，以更加广泛的发展中国家利益诉求可以争取到一些谈判的筹码。如果中国谈成，释放文本的话，可能对美国也是有吸引力的。因为美国要重塑全球经济领导者的形象，如果没有中国配合，它也很难。但是中国多大程度上配合，怎么配合，奥巴马的表态是说给美国人听的，我们不能将其解读为不欢迎中国加入 TPP，美国到底对我们加入 TPP 是什么态度，有赖于我们怎么做工作。

第五，从中美来说，我们应该正式表达我们加入 TPP 谈判的意愿。一定避免重蹈美国在亚太行上的负面表态所带来的不良效应。其实这个没有给美国加分，而是给美国减分的。你只要按照高标准、透明化运营，美国就不敢反对。这样的表态有利于我们以实际行动践行我们提出的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我们在谈判阶段，要有一个分阶段的实施策略，这当然要涉及到具体的产业部门和产业领域，要做好部门领域的数据调研和影响分析，特别是新兴领域，比如生物制药领域、电子商务。刚才冯老师说的条款，我们和韩国的错误要避免。我们要了解现在的潮流，了解电子商务法。现在我们很多监管已经落后于产业的发展，比如现在滴滴打车，或者股票市场的自动程序交易，监管已经落后于经济发展的技术手段。所以在下一个谈判里面，我们一定要做好调研和分析。

第六，就是针对一带一路。关于一带一路的声音很多，我们都在做一带一路。大家可以看《大国的兴衰》那本书。现在都在讨论中国成为全球化大国有什么要素，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是，一个国家成长为大国，最忌讳的是把资源过度往海外转移，这样会消磨这个国家整体的实力。我们现在的一带一路战略，我们说是过剩产能的合作，产能的转移，但也是资源的一种外移。如果弄不好，有可能给经济带来反向的效应。所以一带一路一定要和 TPP 的规则和制度接轨，保护我们在海外逐渐增大的经济利益，这是值得切实研究的。

**冯军：**插一句，谈到一带一路，我们说自己没有预设条件，我们是根据各国的自愿情况去帮助各国发展。听上去很美妙，但是在国际投资中，如果没有法律制度保障，这个投

资一定会成为很大的不确定因素，一定要在一带一路上法治化，国际化，市场化。

**乔依德：**这次为什么民间反响这么大，因为前一阵自我陶醉太多，我觉得整个社会存在一定的浮夸之气。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总觉得别人不行了，我们行。金融危机爆发，有本身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在里面，不是你这个国家没有发生金融危机就是行，这里面很复杂，不是这么简单的。这次大家反响那么大，就像被别人打了一拳。拿一带一路来说，还是太虚，我们的思维方式还是有很大的问题。就拿马歇尔计划说，它有一些基本的东西，有意识形态的东西在里面，有针对苏联的东西在里面，当时马歇尔做这个事，国内也反对很多，也害怕。我们现在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大家搞这种研讨会，到底讲了点什么东西，都是空的，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又是论文，又是研讨会，都是空对空。和别人一比较，别人的规则领先，它的东西切中要害。作为反省来说，已经说了一带一路，也不可能收回来，接下来就要吸取别人好的东西做实。在第一线的人也是有明白的，中投的一个副总经理讲得非常好，我们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是在用纳税人的钱，绝对不能开玩笑。我很担心，我们国家做事情，经常会那个的。包括你讲的，媒体都是跟着文件走的，一弄就是一哄而起，实际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应该大家拿出来讨论。我们在沙特阿拉伯做轻轨也亏钱了，都是政治驱动，国外就是害怕你这个东西。为什么国有企业要中立，就是这个原因，不计成本钱投下去，人家也害怕了。印尼政府不出钱，不担保，日本不敢做了。我们这里不管，说中国做。我也不能说不应该做，但是我有点担心。舆论都在说要怎么竞争，把它拿下来，如果真的是

因为劳动力成本低而拿下来的没有错，但如果是有政治动机的，我觉得有问题。从这个角度，我觉得要有一个反省。

我们现在的难度比 WTO 那时难多了，不是经济上的难，是整个东西。进 WTO 的时候，大家实事求是，美国也想得一点好处，基本上谈经济，但现在不是了。因为从 2008 年、2009 年以后，你的很多做法，让别人对你有戒心。我们的舆论宣传都是别人不好，我们自己都好，其实也不是，我们很多地方也做得不好。到底在这个战略中，希望中国在这个世界上占什么位置，没有想得很清楚。可能最近稍微好一点，中美谈判谈下来，有时候还是自我想得太高。我觉得 BIT 是很难的。

**冯军：**现在有微信，瞎说要负责任的。举个例子，有些人有名人效应，叶檀就讲，奥巴马说美国不能让中国等国家来书写全球经济的规则。我估计她自己也没有看过原文，奥巴马是讲了这句，但是他的前后是拉开的，然后她把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说，这个是偷换概念，误导自己，这是没有意思的。

**乔依德：**从这个角度，还是有些担忧，当然这个事情也不是一天两天能解决的。美国总是乱哄哄的，但是乱哄哄后面，还是把握住整个的大的东西。我们这里好像很好，但后面的东西没有想得很清楚，以后吃了亏到底怎么样，这个事情还是有很大问题的。

**李慧勇**（申万宏源研究所首席宏观分析师）：刚才听了张老师和冯老师讲的，我们有时候是券商，是做投资研究的，感觉就是那么一回事。就我们关注的来讲，从二年之前关注这个事，那时美国开始在这方面主动推进了。我自己觉得，我们要认识一个问题，首先要看它产生的背景，才能想

到比较好的应对。在市场看来，背景就是三个。

第一，以中国为主导的背景。我们的经济实力如日中天，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们想发挥我们大国的责任和作用，我们也希望借参与各种组织，WTO、IMF，包括亚投行等等来发挥我们的作用。不能说重建规则，而是来修改规则。这个变化跟 TPP 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中国太强势，可能影响其他大国的利益，利用现有的规则和你抗衡，同时它觉得 WTO 人多势众，你这么牛，我就不跟你玩了，另搞一个，可能和中国的实际转变以及急于发挥大的作用有关系。

第二，直接导致了多边谈判框架的受阻和被迫搁置。从国际规则和国际治理来讲，多边谈判的过程中，可能比较费时耗力，但是一旦谈成，是比较有效益的。如果所有的规则都在 WTO 框架里面谈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正道，是一个良性的发展轨道。由于中国和发达国家的矛盾，它就谈不了，就导致一个新的规则产生。同时出现了一个逆全球化的倾向，逆全球化就是小的区域化，双边小的区域化取代过去一个大的规则。刚才冯老师提的，在我们 TPP 之前，大家可以看一下过去十年的双边协议，双边自由贸易区协议签订和前十年相比是明显增加的。大家都希望追求经济贸易利益的最大化，我就一个个去谈。大家都这样来，原来的规则就更不能发挥作用。这是第二个背景。

第三，TPP 在相当程度上适应了全球价值链重塑的格局。WTO 也涉及了很多，但是更多的就是产品。从经济发展的趋势来讲，需要有一个更高形态的一体化组织，就是涵盖了新的贸易形式和贸易相关的投资。刚才提到了政治形态，比如环保理念、劳工理念，都牵涉到这块。这就是我理解 TPP 的三个背景，三个背景其实在任何一个规则里都可

以形成，可能都不至于对中国产生太大的影响，因为中国体量太大了。但是如果美国加入到一个规则里，立马就把双方对垒的格局改变了。

我特别关注了商务部（包括从事外贸的）对 TPP 态度的转变，就是以美国加入为一个拐点。美国加入之前，原来 P2, P4, 后来日本说要加入都无所谓。后来美国说加入，为什么冲击这么大？我觉得奥巴马是不能连任的，是给下一届做一个政治遗产，结果谈成了。国内各方面知道这是会发生的，但是存在侥幸心理，这样冲击就比较大了，这是我们应该反思的一个大的背景。中国其实实力是在这放着，我们也想多发挥作用，都可以理解。但是我们确实确实没有把现有的规则、现有的格局以及刚才张老师讲的让度的底线这些东西做好。我们就好大喜功，天天讲我们很成功，最后可能失去了对形势把握的敏锐性。我们的研究也希望从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的新格局来看这个 TPP 以及对我们的影响。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我倾向于 TPP 是针对以中国为代表的经济体而特意设计的东西。当然这个东西稍微有点阴谋论，包括劳工问题、环保问题、知识产权问题、电子商务问题。老的规则已经形成了，所以我们还能讲，但新的我们也没有规则，这恰恰是中国的一个软肋。将来中国也是搞服务主导，希望提高服务贸易比重，从简单的低端到高端其实就是服务，这个规则在中国是空白的。我们自己不承认我们就是代工，我们就适应那个环境，别人也知道如何应对中国，我们自己也知道是软肋。所以我的观点是，TPP 是针对中国的。按照这个判断来讲，我觉得中国其实也应该看到这样的趋势，是在主动求变，但是不得法。

第三个方面。先讲自贸区。自贸区当时研究很多，上届政府提出这个动议，这届政府在 2013 年挂牌，大家对自贸区解读那么多，我觉得学界业界的解读是正确的，这是为我们更好地或者在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做一个试验田。我们刚才提到负面清单管理，包括在上海等地方试点知识产权法院，包括我们允许更便利的资金流动和投资等等，这些东西和我们谈的是一样的，中国也是有准备的。但是比较困惑的地方在于，我们每次总结自贸区的成就，总结最多的是商业制度改革，我们吸引了多少企业、多少个总部，从来不问这个东西到底发挥了多少经济效应，是符合预期还是不及预期。我和自贸区管委会的聊天，也是这种感觉。初衷是对的，BIT 谈判以它为试验田，再推广到全国。最终两年下来，现在已经变成四个自贸区了，缺少事后的评估。这是起了一个大早，赶了一个晚集，最后是怎么收场的感觉。

再就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是 2013 年 9 月份提的。我们有时候可能会讲故事多一点。我们说一带一路就是弯弓搭箭，希望突破重围。北边是美欧自贸区，南边是太平洋 TPP，美国又重返亚太，正好是突出重围。这个战略构想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没有真正的机制，包括这次我们推出了一个“一带一路共同行动”计划，我也不知道在国际贸易规则里面这是什么层次的协议，就明确了几条线。这牵涉到民主和非民主国家的问题，我们是政府说了就算，但是对方国家和你谈成之后，要通过议会表决才会安排相应的预算、政府资金的配置，包括定价机制等等。

**李慧勇：**中国有很多目标，但是没有具体的目标。比如在海外，政府有一个承诺，到期兑现，肯定都是有一个说法

的。我们没有一个具体的时间约束。

大的格局是在多边达不成协议的情况下，通过双边谋取自身利益，我们也做了很多的事情。比如在过去三年，中韩谈成了，也是有成果的，尽管还是有点保留，也是中国应对 TPP 一个措施。现在有一种说法我也带点疑问，TPP 加入好，不加入也不伤大雅，原因在于 TPP 的 12 个国家里基本上三分之二的跟我们有不同程度的双边协定，这代表官方的一個宣传。

**冯军：**商务部和外交部的观点很清楚，发言人的表态相当好，相当有水平，就是包容性。

**乔依德：**这次表态还是可以，是从正面理解 TPP。你说的是一部分人的舆论，不一定是官方的，但影响还是有的。

**冯军：**我补充一句，尽管我们 RCEP 还早，具体的框架内容还没有形成，你能说我 RCEP 就是排挤美国吗？换句话说，TPP 里没有金砖五国，为什么不是排挤印度，为什么不是排挤巴西，唯独是你中国，什么事都要说人家对着你，这个东西大可不必。中国有发展高水平、高标准、高自由化的 FTA（自由贸易区）的自由，其他国家也有，对我们有负面影响吗？一定有。这个要正确认识，但是用不着说别人是阴谋对着我。

**乔依德：**你的话我是又同意又不完全同意，你不能不考虑政治，中国确实跟别人对着。去年亚信会议，领导人讲“亚洲人的亚洲，亚洲事亚洲人来管”，我们老百姓听过就算了。国际上一看这个话，中国就是把我們排挤出去，老百姓听了没有人记住，国外就记住了。领导人在这个会上讲的，也是有针对的。这里面有很复杂的因素，不是说没有地缘政治，有，但也不完全是。微信上有一句话，人家不带你

玩了。华盛顿邮报有一个社论，“CHINA, MADE IN USA”，中国起来是靠美国的，这些人看得很清楚，不是说没有看清楚。所以我觉得，大的战略由不得我们说，但是最高领导就是要考虑这个事情。

**李慧勇：**我现在到北京去开会，都是谈这个。

**乔依德：**北京的部委他们讲话都不一样的，口气都是很大的。

**冯军：**你说的是事实。我觉得国家的表态要有包容性，因为客观影响是在里面的。我气场大，就能兼容你；我气场不行，你说阴谋也好，阳谋也好，都没用的，不解决问题。关键是你自己的事情要做好，你的经济有活力了，你就有活力。现在为什么担心？我们的经济处在下行的通道，就怕汇率、贸易这几样东西。

**乔依德：**我刚从秘鲁的利马开会回来，人家就这么说你，中国现在政策的信用度大大下降了。他讲得很客气的，他说5月份到中国来和很多人都谈了，股票市场那么高没人反映，没有人对这个事情表态，他就认为这个事有问题。他认为你没有市场化，市场化不是仅仅停留在三中全会的一句话上，要体现在很多地方具体去做。

最近有人跟我说，亚投行搞了，就促成 TPP 搞成。对方也在看你，就像我们看对方一样。但是这个没有关系，是有这个博弈的。我觉得归根结底，我们自己到底希望或觉得中国在世界上处于一个什么地位？我个人觉得，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自己把自己看得太高。全球化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不全球化不行，全球化了很多东西不在你手里，比如货币等等。现在我们的官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都不想弄，这里面就有很大的问题，跟别人解释都不愿意，现

---

在官员都是这样的心态，你怎么弄？跟美国人谈负面清单，完全处于下风，根本无法谈。人和人之间、国家和国家之间是一样的，对别人不尊重，看不起别人，别人也这样对你，现在就是这个问题，中美关系就是这个问题。

**李慧勇：**第一是现实如此，第二我们也不是坐以待毙，我们有应对，应对的初衷是对的，只是动作变形了，达不到原来预期的效果了。第三很简单，真正的以实事求是态度应对的话，就是正视现实。无论从国际贸易发展的趋势，还是从大国的格局来讲，还是美国主导的，美国是最先进的，这是一个现实。我们应该是怎么样往现实靠，而不是攻击别人的制度，让别人迁就我们。这是放在第一位的。

第二，就是我们按照最先进的东西来优化我们刚才讲的三个应对之策。第一，自贸区要真正成为推进改革开放的试验田。第二，双边自由谈判，在多边谈不成的情况下，还是有可为的。自贸区是一国之内的试点，双边谈判有些能让的就让，也是将来加入 TPP 的一个试点，看是不是可以承受。第三，一带一路要择机而动，看有多大的进展，不能急于求成。前面的宣传过火了，大家慢慢会理解的，开头好了，中间过程是漫长的，将来希望一带一路是五通，水到渠成的结果。重点还是按照前面两个，一个是自贸区，一个是双边的 RCEP 做突破。我觉得兵来将挡，水来土淹，我们能不能花更大的代价，在 RCEP 方面签一两个有意义的协议？我觉得要做一个回应，反正总是要签的，这样的话，整个国际上的形象好一点。

**肖明智：**这次 TPP 谈判涉及到了投资、贸易、劳工保护等很多方面内容，前面几位老师讲得很全面，我讲一下之前做的一些研究。

我们是用了一个全球贸易模型，量化了贸易自由化的一个影响，包括两个方面。一是 TPP 建成以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下降的一个影响。要说明一点，TPP 其实是与多个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叠加的，所以考虑 TPP 净影响的时候，要减去已经签订的多双边贸易的影响。以中国为例，中国与东盟、智利、秘鲁和新西兰建立了自由贸易协定。新加坡基本上与 TPP 所有国家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这里我们通过一个测算，如果中国被排除在 TPP 之外，有一个贸易转移效应，中国的 GDP 受损 0.14%。但是，如果中国加入这个 TPP，将会得到 GDP 两个点的好处。这样对比一看，中国如果不加入 TPP，机会成本是 2.2%。这次我们的文章被媒体误导了，说中国不加入 TPP 会受损 2.2%，我们的本意是有 2.2% 机会成本，中国实际受损是 0.14% 的 GDP。

然后看 TPP 签订的这些国家里，对比了一下各个国家受益和受损的情况，越南的受益是最多的，净影响有 2.1 个点的 GDP，TPP 对它的影响有将近 19 个点 GDP 的提升，但越南本身是跟 TPP 内部国家签订了多双边贸易协定，所以它的净影响是 2.1 个点的 GDP。在 TPP 内部，对新加坡是一个负面的影响。为什么是负面影响呢？因为新加坡本身就是一个自由贸易港，这些国家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的话，对新加坡也是有转移效益的。外部的一些国家比较明显的是台湾和香港的负面影响比较大，台湾的影响有 0.88 点的 GDP，香港比中国大陆的负面影响大。

对策方面，最大的是可以倒逼国内的改革，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国内的改革，另一个是国际谈判的配合。国内这块，我们应该顺势推动国企改革，放松对私营企业的管制。在放松管制的背景下，中国私营部门收入的年均增长可以达

到 13%，这是两年前的一个测算，现在可能低一点。如果推动国企改革，可以提升中国净增长的潜力，缓解当前经济下行的压力。

刚才张老师说，要推动国际谈判。最容易的是推动 RCEP 的升级。中韩之间已经签订了自由贸易区协议，现在可以努力推进中日韩三边的自由贸易谈判。然后最难的可能是中美的 BIT 的谈判，这也会缓解 TPP 给中国造成的贸易转移和贸易市场挤压的负面效应。

**乔依德:** 有没有做印度？印度现在的反映怎么样？

**肖明智:** 印度对 GDP 的影响，我们这里做出来是负 0.16，其实和中国差不多。只涉及到贸易这块，没有考虑到投资这块，投资这块很难量化，我们单独对贸易这块做了一些研究。

**乔依德:** 我看到微信上讲到，TPP 里面涉及到货币自由兑换，有这个东西吗？30 章里面没有吧。

**冯军:** 没有货币这个，有金融服务，金融服务提得比较明确，不要在当地设机构，这个也是很厉害的。

**李慧勇:** 就是一个大市场了。

**冯军:** 我通过网络可以提供服务。它是在原有的 WTO 模式上又进一步了，在推这个东西，但是要看你自己的竞争能力。比如华为，我们到华为去调研，华为很明确，巴西要他们把服务器设在巴西，他们也不想设。因为华为的声音太弱，但是当我们的公司在全球布局的话，也需要这样的政策。这两天我觉得我们都疯狂了，连出租车的服务器也要设在中国境内。我现在的理解，跨国公司一定是赢的，因为技术掌握在跨国公司手里，你不玩就不玩，我也不跟你玩。但是它一定会动脑筋，包括服务器，很多是设在新加坡的，为

什么呢？在新加坡，它觉得能控制，美国人也说设在新加坡成本很高的，但是能掌控。新加坡温度高，什么费用都高，最好设在鄂尔多斯，又便宜又冷，但是没有办法，还是设在新加坡了。

**沈明**（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特约研究员）：法律环境的问题。

**冯军**：它对数据中心的安全很看重，就像很多人移民出去一样，因为他觉得资产不安全。如果能创造让民营企业继续大规模盈利的投资环境，如果这个环境能维持下去就好了。

**乔依德**：现在心态不是这样的，加入 WTO 以前的想法是和国际接轨，现在很多的做法、意识形态和以前不一样了。一碰就是国家安全，这个东西怎么办？别人的东西怎么过来？还是有很大的问题的。所以难度就在这个地方。老外又看不懂你这个东西，我们说中文的人也要花很多的脑筋，也搞不清楚到底改革怎么弄，有很多东西和以前不一样了。

**冯军**：我完全同意。

**乔依德**：我举一个例子，当然这个比喻也是有毛病的。就像你下围棋，两种流派，一个是取实地，一个是取势，取势是很难的，弄不好全盘输掉，取实地比较容易，但弄不好会丢失大局。

**冯军**：还是缺乏法治化。

**沈明**：这就回答你前面那个问题，为什么 IBM 把服务器放在新加坡，不放在鄂尔多斯。原来我们都能用谷歌的，现在为什么不能用？原因就是这一点，服务器的问题。因为谷歌的服务器在香港，中国的安全部和中国信息保护法要求它把服务器放在国内，谷歌坚决不干，所以导致现在我们都

不能用，争到最后也就是这个道理。关于高科技数字产品，我们还有一个巴黎统筹委员会的问题，很多东西你是拿不到，即使你加入 TPP 也拿不到。欧美有一个巴黎统筹委员会，对共产主义国家有一定的限制，对高科技产品有限制，比如大规模集成电路有规定，都是很头疼的问题。

**冯军：**还有 BIT 谈判，关键看你自己什么决心。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谈判的是商务部，但实际上是具体的管理部门来决定这个领域是否开放。所以真正的谈判筹码，全部不是在商务部手里。我在公开场合也是这样说，也难为商务部了，它没有筹码。比如说，电信产品是工信部决定的。这实际上和我们国内体制是很有关系的。比如稀土，现在稀土价格又很低了。你的管理体制都是行政驱动型的。我们讲国企，讲做大做强，你就不是市场化，就不符合十八大的市场化原则。你讲什么呢？你要做五六个大的稀土集团，这就是行政命令，就不是市场化。所以一旦你政府做出一些规定的时候，人家就说，你这个政府规定违反国际规则的。市场化怎么弄？淡水河谷、必和必拓涨价，你连骂澳大利亚政府、巴西政府的想法都没有，因为那都是企业涨价。不是你想市场化就市场化了，这个东西还得深化体制改革。当然，十八大也说了，要做大做强国企。所以看它需要什么，有时候它说我要做大做强，有的时候说要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而且要高标准。

**乔依德：**这个内在是有矛盾的，不兼容。

**张平：**什么叫社会主义国家？这涉及到基本经济制度，国企改革涉及到国家的基本制度，这个是很难的，国有经济要占主导地位。

**冯军：**我们现在讲国家战略，但是对企业来说，意味着

什么？很多律师、企业提出来，我们现在海外投资，很多的资源市场都在海外，我们企业很愿意到海外投资。但是一旦说到国家战略，很多小国家都害怕。国企去投，一旦你的国企占了别的国家投资的重大比重，就影响到它的经济命脉，凭什么？我们轻描淡写，说我们是为了共同的福祉，没有这么简单的。

**乔依德：**不要说国有企业，对方连民营电信企业都不让别人干。国有企业占领别人，换你自己都不愿意，这个事情很难的。我觉得如果这样想，真的挑战很大的。这个现在和 WTO 以前不一样，WTO 那时候讲国际接轨，现在不是这样讲的。

**李慧勇：**当时我们的心态对。

**冯军：**上海的一个大国企都说了这样话，不是说一带一路，我们就投资了。那个地方平时没有投资，没有产业链，我投什么？投进去我先死，老总也要想的，不是这么简单的。比如上海一个大的集团，我们开小会也是这样说，我们集团也要考虑投资回报收益。现在外面很喧嚣，大部分喧嚣的人都不是具体投资领域的人，话语权又不在他们那边。

**乔依德：**今天的讨论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以上内容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 和平推进中国的政治转型何以可能

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 蔡霞

上海发展沙龙第 110 期

上海新锦江大酒店 2015 年 10 月 20 日

**乔依德**（各位来宾，我们演讲就要正式开始了。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蔡霞女士。她在中央党校攻读了硕士、博士学位，1998 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1989 年以来，共发表学术论文 100 多篇，参与撰写十多部，主持“十二五”期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项。她主要研究的方向是政党意识形态和执政党的建设。今天她演讲的题目是“和平推进政治改革的可能性”，大家也比较关注。下面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蔡教授给我们作演讲。

**蔡霞**：谢谢大家。我是搞政治学研究的，在座的各位朋友搞经济的比较多，是吧？讲经济，我是半句口也开不了的，讲政治也只能说个半句一句。为什么？因为中国的问题太复杂了，但是政治又是大家都很关注的事情。所以我就把我想的一些问题跟大家做一个交流。咱们今天不是讲课，讲课是有纪律的，讨论是没有禁区的。我们现在是进行讨论，就在这个范围里面。今天就谈谈我自己的想法，说的对与不对，大家尽可以批评。

我为什么选了这么一个题目“和平推进中国的政治转型何以可能”？把中国几十年来的变化，放到一个大的背景当中去看，中国社会其实处在一个文明转型的过程当中。这个文明转型，如果从源头上说起，外力推动中国走入近代

以来的人类文明，那是 1840 年以后的事情。从那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过程，要在这个前提下来看今天中国的政治转型问题。我们知道，一个社会的文明转型是全方位的，起步一定是经济，经济首先发生重大的变化，然后社会结构发生很大的改变，人群分化了，利益分化了，人们的思想文化观念发生很大的变化。再下来是什么呢？再下来就是政治运作的机制、制度环境必须要跟着改变。打一个最简单的比方，经济就是做大饼，大饼做得越大越好，这是大家都喜欢的，这就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政治是干什么的？政治其实就是分大饼，也就是说，这个大饼怎么分得公平。你富，富的有理，大家觉得可以接受，哪怕我比你穷。毕竟你聪明，你勤劳，你创造了，你创新了，那么你多拿一点，我觉得我可以接受。富，要富得社会可以接受；穷，要穷得社会有希望。哪怕我现在穷，但是我努力干，我子女的日子要过得比我好，我的希望在前面。这样，这个社会相对来讲比较平和。换句话说，就是我们讲的“和谐”。和谐不等于没有冲突，社会是有冲突有矛盾的，但是这种冲突和矛盾需要由制度进行化解、协调、平衡。经济社会变化的后面，跟着的就是政治变化。在政治变化的过程中，人们的思想观念、政治心理都会发生重大的变化。由此，一个社会是全方位的转变，从传统文明转变到现代文明的中去。这种文明的转型，对于我们国家来讲，到现在已经快 200 年了，我们还没有转过去。

所以我们要把问题放到中国文明转型这个大背景当中去谈，那么中国现在走到一个什么地步了呢？大家可以看到，首先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座的各位是企业家或经济学界的专家，这一点大家都明白。那么中国社会有没有

---

变化呢？变化了。我们原来叫阶级，现在叫阶层，叫人群。为什么？因为社会分工的高度专业化，社会人群构成的复杂，也就是说，传统社会的结构现在逐渐开始转向了现代社会的结构，一个现代社会的雏形开始出现。这大概什么时候开始变的呢？坦率的讲，是九十年代中期后一点。所以到了2000年前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三个代表”思想，很多人当时把这“三个代表”思想看成是一个新的口号。当时“三个代表”思想提出以后，其实我们是非常兴奋的。为什么？九十年代有了市场经济，中国社会快速变化以后，新的阶层、新的人群起来了。作为一个执政党，怎么面对一个新的社会，怎么来平衡社会多元分化的利益？一个国家在往前走，它的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用什么样的制度框架乃至政治理念去解决它？这样中共才提出了“三个代表”。

“三个代表”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从原来信奉暴力革命、阶级斗争、阶级冲突的意识形态，转向执政党整合社会，用民主政治来平衡各方的利益，然后逐渐推进中国社会走向现代文明。其实它当时已经有了这么一个意识形态转型的苗头了。但是很可惜，当它这个新的意识形态刚刚产生的时候，左右都对它有很大的压力。左的压力是认为，中国共产党要由穷入党变成富入党了，所以党内有很多人认为它在搞修正主义，背叛马克思主义。而这个“右”，我是打个引号的右，什么意思呢？这个“右”并不等于在中国的语境中的左就是正确，右就是反革命，就是反动，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右”就是讲自由民主政治理念的这一拨，在政治光谱上是从这个角度看的。社会上呢，世界外部也有这个认识，看到中国共产党有可能转型。所以，对中国共产党的这种转变，

外部也发出了各种声音，其中包括有欢迎的声音，欢迎中国共产党发生变化，欢迎中国共产党逐渐转向民主社会主义，这是一种说法。

对于社会发展变化以后，新的社会关系、新的社会冲突、社会矛盾，用什么理念、什么政策、什么眼光去看、去平衡、去处理？我们其实是把这些问题搁置下来了。一个政党因为理论上的受阻和意识形态转换过程中的纠结，可以把这个问题搁置下来，但是社会的变化不是按政党和政府自己想的节奏去走的，社会依旧朝着它自身的逻辑或者变化的速度往前走。九十年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毕竟给社会这种变化带来很大的社会动力和社会条件。由此，2002-2003年以后，中国社会的社会冲突、社会矛盾、群体事件，群众信访高发多发，进入了一个比较引人关注的阶段。当然，它是文明转型中必须要经过的一个客观阶段，不管哪一个国家都要经历这个阶段，我们国家也要经历这个阶段。这就意味着，当社会进入这个阶段的时候，就需要有一个政治的转型，来化解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

那么这个阶段，我们国家将会怎么走？从2004年以后，我就在想中国未来的政治转型能够怎么办？脑子里带着这个问题一直在转，但是没有想清楚。一直到今天，可以说我也没有想明白。2008年我到西班牙去，进一步触发了我的思考。这就是为什么要讲西班牙和中国的比较。因为中国的政治转型，早早晚晚有一天是要到的，无非就是在什么时候来而已。我到西班牙去呢，其实也就短短半个月的时间。在这半个月里，只能很粗浅地考察它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其中在一次在参观西班牙国会，听到讲到西班牙的政治转型过程，让我有很多感慨。于是我把西班牙的政治转型

---

和我们中国未来的政治转型，做了大概的比较。这个比较的结果是什么？跟大家说实话，我很悲观。因为悲观，才有了这个题目“和平推进政治转型何以可能”。

换句话说，这个悲观就是未来中国社会在转型的过程当中，它会不会陷入社会动荡？所以 2008 年回来以后，大概有半年的时间，我没能好好睡觉，半夜醒来就想到这些问题。

然后到了 2009 年新疆的乌鲁木齐事件。7 月 4 号晚上的那个事情震动全国，对我来讲震动更大。我想，如果中国不能和平转型的话，新疆的这个晚上将来有可能在全国的其他地方重演。从这个角度讲的话，中国无论如何要把握住——我们在“转型”是必然的——在“转”的过程中能不能防止这种动荡？这就是我要想提的问题。其实这之前的写作状态，一直处在犹豫矛盾中，写写停停。因为我得出的结论是悲观的，但又不甘心这样的结果，那个半年一直是边写边不断地自我怀疑自我否定，一直想找到推翻悲观结论的论点论据，写得特别煎熬，始终难以成稿。发生了乌鲁木齐七四事件以后，我下决心要把这篇东西写出来。无论如何要把问题提出来，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避免悲观结果的出现。因此，中国与西班牙政治转型的比较思考，最初是发在 2010 年的“走向宪政”一书中，那是蔡定剑先生主编的学者论文集，赶在蔡定剑先生辞世前出版，以告慰蔡定剑先生。此后 2012 年，2013 年连续围绕中国的宪政与政治和平转型问题，把中国和西班牙的比较写进去。

最近不知道是哪位，把我前些年发出来的文章又重新翻出来，重新在微信群中流传，主要是这两篇东西：一个是《执政党何以避免二次革命》，第二个是我在北大的一次发

言，讲《宪政无关乎主义》，无所谓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基本上把我原来的思考都讲了。而那个思考，我是尽量正面地去讲的。

今天因为时间比较短，也为了讲述方便，我就直接把问题提出来。为什么我提“和平推进中国的政治转型何以可能”，对中国未来的社会动荡有很大的忧虑呢？因为我觉得这五个问题，无论是在我们国家还是在西班牙转型当中都存在。但是人家解决了，我们现在还看不到很明显的答案，从这个角度讲，我很担忧。

## 中国与西班牙比较中的五个问题

- 1、执政力量未来新的政治空间？
- 2、如何把握民众政治参与？  
——民众的在场与退场
- 3、如何取得基本共识？  
——政治和解与清算
- 4、什么是达成共识的底线？  
——宪法权威与实施
- 5、促成和平推进政治转型的结构性力量？

图 1：中国与西班牙比较中的五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执政力量的态度和作为。我这样表述是为了平和一点，如果让我直截了当地讲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执

政党未来新的政治空间在哪里。为什么说这个问题？

我再往前倒一句，1976年9月中国毛泽东去世，1975年11月西班牙的佛朗哥去世，两个人相差10个月，而后来的30年，西班牙完成了民主政治的转型。西班牙的经济发展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在欧洲算是相当不错的，我那时候在西班牙，它的经济很繁荣。中国在毛泽东去世以后，到2008年的时候，30来年我们有一个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政治的转型摆在面前，无可回避，但是迟迟不敢迈步，一直就没有能够真正启动政治转型。不要以为政治体制改革的说法就是政治转型，不是。实际上九十年代到现在所说的“政治体制改革”，每一次人大开会都在动政府部门的改革，但它只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下端——行政改革。行政改革的目标是要提高效率，转变职能。而政治改革是上端，它是要平衡两种力量。什么力量呢？说到底就是国家权力的力量和公民权利的力量。权力和权利之间的关系，它是要改变和平衡这个关系的。政治改革是上端，我们一直没有很好地开启。而作为政治体制改革下端的行政改革，我们一直在推进。行政改革是取代不了政治改革的。在30年中，西班牙完成了政治改革，我们始终难以起步。

西班牙在佛朗哥去世以后，是怎么完成政治改革的呢？佛朗哥临死前把权力交还给了西班牙年轻的国王胡安·卡洛斯，胡安·卡洛斯看到了一个大趋势，即当时南欧只有两个国家是非民主国家，一个是西班牙，一个是葡萄牙。胡安·卡洛斯接过权力后，有心要推动西班牙向民主政治方向前进，采取民主政体。他想要推动这种改革，但是佛朗哥将军原来老政府掌权的老人们，阻力极大。因此国王搞了一个全民公决，全民投票：来决定佛朗哥以后的西班牙国家的政治

体制。究竟是延续佛朗哥时代的体制，还是像西班牙的邻居欧洲其他国家那样也搞民主政体？参与这次社会投票的公众，达到西班牙全部国民的 74% 多。投票的结果是，91.2% 的投票人认为应该搞民主政体。这个结果放在政府的老人们面前，老人们一看就觉得大势已去，民主政治是人心所向。因此他们怎么做呢，老人们感到未来民主政治是政党政治，那么我们也出去组党。也就是说，他们寻找自己未来的政治空间去了。

那么中国共产党，有没有这样的意识？我们中国共产党执政，一直讲是历史的选择。没错，你领导革命胜利了，人民拥护党跟着党，党走上了执政的舞台。但问题是，60 多年过去了，仅仅讲历史的选择是不够的。我们现在又加一个政绩，政绩可以夯实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但是仅仅讲经济的变化也是不够的。经济变化的后面就是如何分大饼问题，社会公平、社会贫富分化问题都存在，这必然提出执政的合法性将如何来构建这个问题？其实从政治的角度来讲，它一定要走向一个法理型合法性，什么意思呢，就是通过民主选择的机制来认可政府执政力量的合法。因此我们讲，这是必然要走这一步的。我们说，如果把民主仅仅看成是选举，是非常片面的，但是选举确实是民主很重要的一个标志。

中国共产党那么中国共产党，有没有这样的意识？我们中国共产党执政，一直讲是历史的选择。没错，你领导革命胜利了，人民拥护党跟着党，党走上了执政的舞台。但问题是，60 多年过去了，仅仅讲历史的选择是不够的。我们现在又加一个政绩，政绩可以夯实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但是仅仅讲经济的变化也是不够的。经济变化的后面就是如何分大饼问题，社会公平、社会贫富分化问题都存在，

---

这必然提出执政的合法性将如何来构建这个问题？其实从政治的角度来讲，它一定要走向一个法理型合法性，什么意思呢，就是通过民主选择的机制来认可政府执政力量的合法。对于选举问题，是有自己的看法的。在一定程度上讲，如果要搞全国大选，一个是技术上实施不可行。这个要看你怎么讲了，13亿人直选是不可能的，但直选和间接选举的结合是有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对于社会的选举，它会有那么大的顾虑呢？我个人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以后，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国家体制来构建自己的政党组织系统的，所以政党组织的行政化现象必然出现。而政党本身是从社会当中产生的，它的根基应该在社会。但是那么多年下来，我们是依托国家的行政体制来开展党的活动，因而当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生长发育以后，国家行政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是收缩的，这就意味着党组织活动的空间会变小。因此我们讲，中国共产党有没有勇气，去寻找它未来的政治空间，把自己的根基重新扎到社会当中去。选举我不怕，只要党在社会中有自己新的政治空间，在选举当中是一样可以赢得执政党的地位的。这并不是不可以的。所以这是一个问题，要不要寻找未来新的政治空间，这个空间在哪里，你怎么去寻找这个空间，而不是死守原来的想法。这是一点。

第二点是什么呢？西班牙在民主政治转型过程当中，有中左和中右的党派，有极左和极右的党派，最后是谁来谈判呢？是中左和中右来谈判，谈判的结果各方都接受了。它这个转型，相对来讲就比较容易，比较好办。因此这就有一个问题，难道西班牙的老百姓不关心吗，不关心政府怎么改变吗？所以，我们讲在西班牙政治转型中，民众是在场还是不

在场？怎么看民众的在场和退场？其实西班牙在佛朗哥将军去世以后，1976年到1977年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国内的罢工事件此起彼伏，工人运动达到一个高潮，加剧了社会矛盾的紧张度，但是后来毕竟它过来了。而中左和中右政党谈的结果，大家都认了。为什么？为什么民众有压力，但最后又没有真正冲到政治转型的过程当中去，没有自己直接去做，而是委托了政党的力量去谈？我们讲，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就是说，政治家的归政治家，社会公众的归社会公众，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相对来讲有一个区隔。为什么？这就要讲到转型的社会基础。

这个基础是什么呢？佛朗哥将军在他去世前的那十年，实际上已经开始出现国内政策导向的转型，转什么呢？它逐渐把与人权基本保障相应的体系和政策机制制订起来了。比如，工资谈判机制，使劳工和企业谈判，政府搭一个制度平台，你们双方来谈判，政府做一个法律规范下的协调人。因此它对劳工冲突、劳工矛盾，有了一个法制化处理的平台和空间。比如说失业、养老、工伤医疗。如果你工伤了，有医疗救助，政府对企业主有要求，企业主要承担多少责任。像这些它都有了，而这些都是作为法制来推行的。因此当政治转型的时候，民众在基本人权保障的体制和机制有效运转的情况下，自己的基本利益有了，它不会再直接参与政治转型谈判了。这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大王旗可以改变，民众的日子呢，我照过我的。

那么中国现在是什么状况呢？全民谈政治，是不是？尤其北京的士司机，张口闭口都是政治，为什么？中国人经常讲一句话“安居乐业”，乐业是指各行各业该干什么就干什么。该搞经济的，安心把企业做大；搞艺术的，专心搞你的

---

艺术；该搞政治的，去考虑社会公众的要求，怎么制定政策协调平衡利益，怎么修订法律，征求社会公众的意见。对小老百姓而言，开一个小饭馆，他把小饭馆开好了，自己日子过好了就行了，这就是我们讲的安居乐业。但是，为什么我们都卷在政治当中，大家都在谈政治？因为我们一些体制和机制，或者说，实现和保障人的权利的机制，还处在构建过程当中，大家都有很多不满意。一不满意，所有东西聚到最后，都要聚到政府和政党的头上来，导致大家都谈政治。在这种情况下，政治转型非常困难，因为人人都参与。社会的不满意程度越高，社会改革的环境就越不宽松，政治改革环境也不宽松。环境不宽松，你一旦要启动，很容易出现局面失控。从这个角度来讲，王岐山担任党中央纪委书记以后，他推荐大家去看《旧制度与大革命》那本书，不是没有道理的。

那么我们怎么做？我当时想，五个问题当中，社会保障这个问题是最好解决的。因为这实际上就是要中央政府主导，各级政府建设社会保障体系，这个问题其实只关系到人权的基本保障和实现，还没有真正关系到公民权利的实现，公民权利和人权还有不同的。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西班牙在转型过程当中，如何获得基本共识。

这就要追溯到佛朗哥将军怎么走上执政舞台的，要追溯到1933年的西班牙。1933年西班牙内战，当时国内的左右力量血战了三年。三年后，左翼——西班牙共产党被打败了，佛朗哥将军的长枪党打赢了，所以后来他执政了，这一执政就是几十年。到了要民主政治转型的时候，过去的那场血战，大家都是血仇的，怎么解决？在西班牙政治转型中，年轻

的国王胡安·卡洛斯联合了西班牙当时政府的年轻首相苏亚雷兹，他们合作推进民主政治的转型。苏亚雷兹首先宣布的就是西班牙共产党合法化，欢迎他们回国参与政治进程。西班牙共产党多年流亡在国外。西班牙共产党领袖宣布不再用暴力来解决政治纷争，愿意在西班牙的宪法框架内，共同推进国家发展。整个过程中，它有一个政治和解的理念。



图 2：西班牙走向民族和解

西班牙有一个地方叫殉难谷，殉难谷里有一个大教堂。大教堂里的左右两边，一边是西班牙内战中所有死亡的左翼人士的名单，一边是右翼的在那场战争当中死难的人的名单，都刻进去了，大概共计三、四万死难者的名单。最后佛朗哥将军死了，也进了这个大教堂去了。在今天的西班牙人

看来，所有这些死难者都是为国家，为西班牙这个民族牺牲的，无论是左右，大家都去纪念他们。西班牙人认识到，从此以后，再有什么政治纷争，我们通过和平协商的办法去解决，我们再也不搞自己人向自己人开枪，不再暴力流血。这就是一个政治和解。

苏联和东欧在制度改变的时候，你没有看到发生大的社会动荡和社会流血，而中国有可能。为什么？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因为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是从政治开始的。戈尔巴乔夫推不动改革，他就来了一个“不换思想就换人”的做法，先把党内的干部换了。同时把思想领域打开了，他也搞得非常活跃，最后把控不了那个局势，最后是那样的结局。但是苏联共产党在丢掉政权的时候，没有发生大规模的社会清算。我认为很主要的一点就是，苏联的改革从政治改革开始，权力控制下的市场经济还没出现，苏共党是特权体制内的等级享受，而又被体制严严实实的包裹着，一般的民众只知道他们特权，但还没有直接侵犯到自己，所以苏共党整体丧失公信力，但不少党员干部和身边的民众没有直接结怨。所以，他们没有发生大规模流血的社会清算。

社会清算和政治清算不一样。政治清算就是把政治真相搞清楚以后，对错误做个反思、教训、结论。说白了讲，即你曾经犯过政治错误，你认错了，去取得社会公众的谅解。社会公众不再纠缠于你的错误，而是往前走，为国家为民族利益着想。我们不可能要求中国共产党在执政领导中把所有事情都做正确，它探索是要付出代价的，错误和挫折就是代价的一个部分，是不可避免的。如果社会有这么一个心态，当然就很好。然而，中共党领导中国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生长起来了，市场经济打开了人们牟利的空间，但是对于政治

权力的约束机制，直到现在都没有很好建立起来，所以党内很多官员卷入了贪腐行为中。官员贪腐，会加大社会贫富差距，直接引发党和社会公众之间的矛盾冲突。因此，十八大以后到现在，从严治党，在反贪问题上加大力度。那么，在未来的政治转型过程中，这些问题会不会被社会公众提起来？现在这种贪腐官员，在一个地方遭民怨，尤其基层一些干部胡作非为，底层民众对这些干部是很恨的。在很多群体事件、群体冲突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出现这样的状况。中国社会又是一个没有法制文化传统的社会，底层民众相信的是什么呢？“一报还一报”。党和政府这边在转型，那边一些底层民众可能觉得政府不如过去有那么大权威了，那么好，我就可以起来清算政府干部。换句话说，也许到那个时候，不用其他人来说，底层民众自己就动手搞社会清算了，而这种动手就会造成或加剧社会的动荡和流血。这是我担心的第三个方面。

第四个问题是什么呢？西班牙政治转型时，长期对立的两大政治力量坐下来，国王和他们一起坐下来谈，以及和老政府的人员坐下来谈，以什么东西为框架，在什么基础上谈？这就有一个共识的底线在哪里的的问题。他们共识的底线在宪法。当政治改革进程启动以后，对于西班牙宪法的起草修改，胡安·卡洛斯国王和苏雅雷斯首相邀请了各方政治力量共同参与，然后又广泛征求社会的意见和开展社会讨论，最后全民公决。这个宪法是左右各个力量全部都认可的，不管有多大的意见分歧，各党派一定在这个基础之上参与政治进程，他们绝不突破宪法，无论如何都在这个框架内推进改革。

那么我们现在就有一个问题，一个国家在转型过程中要

---

使社会有秩序，首先宪法必须要有权威，现在宪法的权威够不够？宪法实施的力度怎么样？中央在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快推进中国的法治国家建设，我觉得是很有道理的。坦率的讲，民主就像一锅水，你把闸门打开了，如果没有法治秩序的渠道，打开闸门之后民主之水漫天漫地的流，那么有可能带来国家大的动荡。但是如果法治这个渠做成了，大家都有规则意识，都认可社会基本秩序的话，那么政治分歧是能通过一定的制度和机制来逐渐协商谈判的，这就比较好办。现在党对宪法的认识是在逐步提高，问题在于宪法是否真正得到很好的实施？社会公众对于宪法的认可度怎么样？这也是我现在第四个很担忧的问题。

第五个问题，西班牙在政治转型的过程中曾经发生军事政变。军人参与到政治竞争当中，他们不满意民主政治的和平转型，发动了政变。军人占领了国家的广播电视台，说我们要保卫国王。政变军人要求国王到西班牙国家电视台去发表公开演说。胡安·卡洛斯国王说，我可以演说，但是我不到西班牙国家电视台去，我要在王宫里面说。为什么？王宫是由他的王宫卫队控制的，军队不可以进到王宫里面来。他要求国家电视台的工作人员进他的王宫，他在王宫里发表了一刻钟的讲话，他说我支持苏亚雷兹和卡里略他们的民主政治转型，我希望大家都以我们西班牙的民族利益为最高利益。本来赶在半道的外省军队以为真的是国王遇到了威胁，他们要去首都保护国王，听了这个讲话以后，就退回去了。这场军事政变没有流血，把两个政变的主要领导人给抓了，就平息了。从此以后，西班牙的政治转型就平和地过去了。

国王一个人居然有这么大的力量，他的力量哪里来？这就讲到了促成和平政治转型的结构性的力量。所谓的结构性力

量，不光是世俗社会的不同利益群体，不光是不同的政党、团体、组织，包括政府。结构性力量还包括对世俗社会生活有很大影响力，但又超越世俗纷争的力量，这是什么东西呢？在一个国家，尤其在欧洲国家，你可以看到两股力量，一个是国王，国王是民族的人格象征、人格代表。在世俗生活中，你可以支持这个党、不支持那个党，你可以支持这个观点、不支持那个观点。但是只要国王说了，大家都听。为什么？因为他是这个民族的人格代表，我认国王，我支持国王，我相信国王，国王说的话我都听。这就是相当于我们的农村，一个村子里有了纠纷以后，最老最有威信的那个老人家出来讲话，大家都听了，一样的道理。这是超越世俗政治纷争的作为民族人格象征的力量。第二种力量是什么呢？是宗教。宗教是超越世俗政治纷争的一个非世俗的力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可能就有这两种力量。正是西班牙国王——这种结构性的力量促成了西班牙政治的和平转型。

那么我们国家呢，我们是一个世俗社会，我们缺乏这两种结构性力量。历史上没有全民族共同的宗教文化，我们也没有国王。我们怎么办？在中国的政治转型过程中，当有很多矛盾冲突、各方都不能很好解决的时候，我们是用暴力去解决还是坚持和平的民主的方式去协商、谈判？因为我们没有非世俗的结构性力量，为了和平转型，我们尤其要重视宪法和宪法实施在民主政治推进过程中的保障和维护，这是特别特别重要的。这个问题尽管我们现在还看不到，但是中国早晚有一天要面对的。而政治转型不是一两年就过去的，在中国也许是几十年很长的时间。

这五个问题，到现在为止是无解，我还没有看到有明确的解决思路，所以我很忧虑。无解的背后是什么呢？为

什么这五个问题在我们国家很难解？这里有两个重大问题，一是制度逻辑，一是思想困境。首先是制度逻辑，是人与制度的博弈。当我把这个问题提出讨论后，有一些学界朋友跟我讲，你为什么不把中国大陆和台湾比，中国和南韩比？毕竟都是东亚国家和地区，是我们讲的中华文化圈里面的。西班牙这个国家的制度和中国的制度，其实还有很大的不同。我觉得说的很对。我们现在的这个制度，坦率的讲，既不是我们传统所认为的独裁专制的制度，也不是一个现代民主政治的制度。它是个什么样的制度呢？我们叫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西方社会把凡是讲共产主义的国家都认为是极权制度。这里面学术的分歧非常大。因此我们这个制度，你拿一个什么词去衡量它，我觉得现在很难。

为什么讲这五个问题很难解？因为制度本身的逻辑决定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这个逻辑是什么？这需要我们探讨。我觉得，党的领导是必须要的，中国在转型当中要有一个政治力量去主导它。但是怎么理解“领导”两个字？还有你“怎么”领导，又是学术上值得我们很多思考的。这两个问题如果不解决，我们往往把“领导”理解为党高于国家，党高于我们现在讲的法。另外一个，你“怎么个领导法”呢？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就是控制了所有的资源，社会没有任何的空间。现在是市场经济生长了，这个社会是不可遏制地生长起来了，因此这种社会的空间逐渐出来了。经济发生了变化，而政治制度很多东西没有变，按照马克思的话来讲，经济决定政治，政治上层建筑或迟或早都要改。如果你政治上层建筑不变化，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经济的发展。其实这是最基本的理论。但我们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真正去研究和理解它，没有主动去做。

## 问题背后的思考

- 1、制度逻辑和人与制度的博弈
- 2、理论困境和思维方式
- 3、和平转型的中坚力量和坚实基础
- 4、我们能为未来做什么

图 3：问题背后的思考

在社会矛盾这么多的时候，按照原来的那种思维去解决问题，实际上这个制度的逻辑是什么？这个制度变成了一个什么呢？事实上，它是一个高压下的负面循环制度。换句话说讲，上面把压力灌到下面来，干部的压力很大。大家从实际生活可以看到，一旦社会发生矛盾、发生问题，上面查处的时候，先不说你有多大的责任，先就地免职，总要给老百姓一个交代吧，免职以后再来说。这个免职给其他干部和他本人都带来极大的压力，所以我们讲，这是一个体制内的、从上往下传递压力的制度。所有干部都怕被免职，所有干部都要为自己头上的那顶帽子负责。那么他就要把当地有可能发生问题的所有因素和苗头都消灭在萌芽状态，因此他不自觉把上面传递给他的压力转嫁给别人，转嫁给谁呢？他如果有下级，就转嫁给下级。如果下级的党员干部没有下级了，怎

么办？直接面对老百姓，这个压力就转嫁给老百姓。怎么转嫁法呢？就是把社会一切可能发生问题的因素扼杀或者消灭在萌芽状态。因此我们看到，强制性地解决问题的措施很多，你看着好像解决问题了，其实没有。它把很多东西压下来了。这等于把压力传递到社会，社会的不满一点点积累，总有一天压不住，在某个事情上一下子又爆发了，这个压力再传到体制内。这个制度逻辑就是一个压力的恶性传递，在体制内从上往下传，再由体制内往体制外传，然后体制外再往体制内传，是这么一个恶性循环。这是第一。

第二，越是因为压力大，体制就越容易收缩。收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越要用这种比较强制的简单的办法来保护自己，拒绝对外的沟通和交流。所以我们讲，体制越来越往里面收缩，把所有东西越来越封起来。这也就是这些年大家感受到的，有些地方改革没有往前走，而是往后退了，它不仅仅是既得利益问题，还有体制本身的惯性逻辑问题。因为它怕出问题，所以用传统办法来解决是最好办的，传统的办法就是向内收缩。这就是体制的逻辑。

这种体制逻辑会导致什么呢？这个体制如果释放压力，向外开放，政治体制开放一个口，把体制外的一些吸收到体制内来，通过体制内外的交流来化解很多问题，那样就好。但是我们现在做不到这一点。这种压力负面的传递，最后会导致什么呢？导致在压力当中这个体制崩塌了。这我也是很担心的，最后哪一天，某一个事件突然像导火线一样，但是你再也控制不了这个局面，这个体制轰然倒塌了。那么，体制本身有没有可能改？我们现在问题就是，当社会的情况比较好的时候，有些干部和官员觉得日子还好过，矛盾不那么尖锐，不那么突出，可以不改。但是当真正矛盾问题尖锐

突出到逼着你改的时候呢，就是因为矛盾太尖锐了，又怕万一改了，局面失控了。日子好过的时候不想改，日子不好过逼着你改的时候又不敢改，要么不想改，要么不敢改，它在这两个当中纠结来回挣扎。最后这种纠结和来回挣扎，就会把执政党自己的余地搞的越来越小。刚才我们在座的一位说到改革有个窗口期的问题，我特别赞成这个观点，真的是这样，改革的窗口期就是把握时机的问题。那么，这就有一个如何打破体制的逻辑的问题。我们现在看到这种打破，人和制度的博弈，其实方方面面都表现出来了。体制内的人和制度是怎么博弈的，体制外的人和制度是怎么博弈的，有各式各样的表现，各式各样的情况，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多年来，我们面对社会矛盾和冲突，我们犹豫，走不出来？这些问题要不要解决？当然要解决。关键是解决的方向和操作思路是相互关联的。不看方向，光从技术操作上去解决问题，就会落入到事务主义的圈子里面去，而忽略了中国社会所有这些问题的出现与社会发展的规律、趋势有什么关联。其实在那些年，我们党在这些问题上没有研究，或者说研究得很不够。一个理论真正的创新，是要着力于把握社会发展的趋势、社会的本质和规律来思考面对的现实问题，这才叫理论创新。但是我们没有做到。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理论困境到现在为止没有打破，这和我们思维方式有关系。因此我们讲的解放思想，不仅仅是提一个新观念，说到底是要改变我们看待社会发展、社会矛盾的思维方式。我觉得，政治上的思维方式要改，学术上的思维方式也有要改的，要确立中国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转型的过程中充满社会冲突，那么和平转

---

型的中坚力量和坚实基础是什么？转型中是充满着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我们怎么解决它？而且这个转型的进程，什么时候开启，都很难说，也许我们现在就在转，也许我们还没有开始。往往是要到这段过去以后若干年，回过头来看，才看清楚原来当时发生的一件不起眼的事，后来引发了什么，变化是从这里一点点开始的。因此政治转型的过程，很难讲是说顶层设计好了，按部就班的，不可能。大家可以看到，对社会的这种高压，体制内外压力的恶性循环传递，整个社会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2010年有暴力残杀孩子的事件，公众说：你杀孩子不对，你是狗熊。但是，你杀贪官就对了，你成了英雄。对吗？不对，没有法制观念。另外，矛盾聚焦最后都聚到党员干部头上去。一个幼儿园的围栏上挂了一副标语“冤有头，债有主，前面右转是政府”。换句话说，你有什么怨气，不要到幼儿园找孩子的麻烦，你不要去杀孩子，你有事情尽管找政府去就好了。社会快速发展过程当中，必然有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这个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又聚焦到政党和政府头上去。这就是一个压力，社会以这种方式向政府传递压力，政党和政府感觉到这种压力以后，上面又给下面施加压力，下面再把压力放大施加于社会，这就是一个压力的恶性传递过程。

这个体制逻辑上面已经讲到了，那么有没有推动和平转型的中间力量呢？其实，如果公民社会生长起来了，转型中的和平中坚力量也就可能产生了。图3是今年获诺贝尔和平奖的“突尼斯全国对话大会”的四名负责人。中东、北非这些国家，包括叙利亚、伊拉克、埃及，都是比较专制独裁的国家，它们在进行政治转型和政治改变的时候，重新陷入动乱。但是突尼斯避免了这场危机，当然仅仅是初步开始，

以后是不是真正能够站住，使民主政治能够落地生根巩固下来，还很难讲。在突尼斯同样遇到转型危机的时候，他们四个人，一个代表工会，一个代表律师群体，一个代表人权组织，还有一个代表雇主。这四大社会群体，联手起来，对问题进行对话、妥协、谈判，避免了像叙利亚这些国家的政治动荡，所以今年他们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一个国家在政治转型过程中，维护这种和平，形成这种对话，极为重要。这些人就是和平推进的中坚力量，这是他们的代表人物。要有领袖式的人物出来，领袖式人物是不是一个孤零零的人呢？不是，他们每个人后面都代表了一支社会结构性的力量，他们当中包括律师，包括企业家，包括工会，还包括反对党。她的丈夫被杀了，她没有个人复仇，而是自己参与到这场对话当中来，维护了整个国家的和平转型和政治发展。



图 4：“突尼斯全国对话大会”获 2015 诺贝尔和平奖

所以在转型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培育出这种坚实的社会基础和中坚力量来，使我们国家不再通过暴力，而是通过民主协商、和平对话来解决化解政治纷争。这样的话，对于社会，对于执政党，对于政府，都有好处。我们能够为未来做什么？这种坚实基础是什么？就是一个国家理性力量的生长。这种理性力量的生长，无论是对于执政党、政府、学界还是社会公众，都需要。我们现在没有这样的理性，往往一谈到政治，都是一些比较极端的情绪。坚实基础是什么？就是社会的生长和发育，真正能够使社会自我管理、自我组织的能力和水平提高起来。这样的话，很多问题是比较好地解决的。

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社会的支撑，民主很难成为一个推动国家发展的比较好的东西。所以我们讲，真正的好民主才是好东西。好民主要有社会的生长发育，这个“好”字才能出来，要有理性，要有组织，要有规则，这些是我们需要做的。公民社会的生长发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培育公民社会的工作，需要长期的努力。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们这个国家是没有社会的。到现在为止，社会还在艰难的生长过程当中。所以我们讲，中国的政治转型将会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而这个过程，需要我们大家耐心地去合作建设性的工作，而不仅仅是批判、否定和愤怒，那是不够的。更多是要建设、合作，这需要我们去思考，去反思自己，从自己做起。好，谢谢大家，我说的不对的，请大家批评指正。很多问题我来不及敞开展讲，敞开展讲的话我们可以讲一天，每个问题都可以讲很多。

**乔依德：**我们非常感谢蔡教授对于比较敏感的问题，做了很清晰的阐述。下面我们还有一些时间，大家提问题，或

者做一些评论也可以。

**嘉宾一：**蔡教授，我看过你的《宪政无关乎主义》，我想提两个问题。第一个，你刚才讲政治转型，但是我想，在国际当中，一个大国是绝不允许出现另一个大国的，就是国际政治中霸权的挑战。中国国内的政治转型，不仅仅是中国自己的事情，还涉及到美国或者其他地方，它对国际的影响，你没有提到，这是一个。第二个，你刚才讲 1840 年以后中国开始融入世界的潮流。但是还有一种说法，是最近几年出现的，一批学者、政治家认为政治转型目标的设定，不能以西方政治作为参照系，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也可能是东方模式的。你是怎么看的？

**蔡霞：**你说的第一个问题是，外部大国对中国的影响？

**嘉宾一：**我觉得，在政治转型当中，其实不仅仅是内部，尤其是像中国这么大体量的国家。执政党的转型，像中国走到现在这一步，它可能更在乎外部的影响，比如美国要颠覆你，所谓国际政治斗争的影响。

**蔡霞：**国际政治不是我的专业，我就不敢多说这个东西。但是我现在是这样感觉的，中国在 20 世纪开始转向现代文明，和西方国家相比，其实已经晚了 200 年了。就是说，人类文明转型的大趋势是肯定的，无非就是你早转和晚转。这个时候讲外部对中国的影响，我觉得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当我们经济快速发展的时候，外面对我们其实是很疑虑的。因为大家都知道，20 世纪，大国在崛起的时候是伴随着战争的。中国国力强盛了，会不会向周边扩张，会不会挑起战争，用战争来确立你大国的地位？现在国外，包括周边国家，对我们的这个疑虑是比较大的。大国重新在世界格局中排定自己位置，其实是国与国之间的一种较量，

---

这种较量是政府和政府，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当你这个国家起来的时候，别国会很关注你会不会再用原来战争的方式崛起？它希望你通过民主政治的方式来解决，这样对其他国家也是一个安全的保障。所以，如果中国国内比较好地走向了民主政治，其实对于其他国家来说也比较放心，这样人家就不是特别担心你，这是一个方面。所以你可以看到，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希望我们建立起民主政治的体制，希望中国共产党能够比较顺利地转过来。

第二个，中国的转型如果不顺利，发生社会动荡以后，你以为西方国家都愿意啊？不是的。中国有 13 亿人，这次叙利亚一个小国家，涌进欧洲几十万难民，欧洲国家已经招架不住了，欧盟就要内部分配名额，这个国家进多少，那个国家进多少，对不对？中国 13 亿，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和平转型的话，国家一旦失控，多少人往外走？走出一两百万，对中国来说是零头，走出去 1 千万也是一个零头，但是对世界上各个国家来讲，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安宁的，尤其是那些大国。所以我们讲，没有哪一个大国真心希望中国内部大乱。从我们自己来讲，我们对于世界大国之间的一些事情，不要用原来那种把别人都看成是敌对势力的眼光去看，这是第一点我想说的。

关于第二点，不可否认，世界对中国是有影响的。我们讲经济的开放，文化的开放，难道就没有思想文化、意识观念的开放吗？一样的，它那些东西都能进来。因此现在中国的民众比过去要多得多地谈论民主政治，谈人权、平等、自由，对不对？你的第二个问题在于，谈这些理念是不是就要按照西方的路子走？不是。在这一点上，我一直和某些方面有不同的观点。平等、公正、民主、自由这些，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都写进去了，这些价值是所有国家都认可的，换句话说，是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普世价值我们可以回避吗？其实是不可以回避的。中国人的汉语是很丰富的，我们老不肯讲普世价值，我们现在提什么？普适价值，普遍价值，还有什么共同价值，说了半天，一个概念。所以我讲，这个普世价值是不可以否认的，民主政治的转型过程，就是为了在中国可以更好地实现这些基本价值的一个过程。

问题是你实现这个价值，是不是就要按照西方国家的政治模式走？不是，甚至你的政治进程和人家都不一样。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邓小平一直在讲，三权分立我们不搞，小平同志说的非常清楚。三权分立是什么啊，是一个政治模式。但是它的背后是什么东西？是一个基本政治运作的客观要求——分权制衡。大家都知道一句话，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权力垄断一定出问题，对不对？所以分权制衡是不能丢掉的，三权分立是可以不搞的。至于你这个国家用什么模式达到分权制衡，每个国家有不同的历史传统，转型的路径依赖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分权制衡这个基本原理，在民主政治的体制中都需要体现，但是它的模式是不一样的。美国人是三权分立，英国人是议会内阁制，法国人是半总统制，有很多东西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讲，模式不能照搬人家的，而政治的进程和这种规律性的东西，不管你认不认，它是客观的、普遍的、共通的，不存在是不是照搬人家的问题。关键是你认不认这个客观规律，认不认这个基本原理，其实就是这么回事。而模式是我们可以慢慢在实践当中探索、走出来的。

**嘉宾二：**围绕图 1 讲的五点，如果结合咱们中国的情况，因为那个是西班牙的东西，结合中国的情况来看，中

国要实现比较和平的进程，这五点中哪一点现在是最缺的，但又是很重要的？

**蔡霞：**我觉得，第五点在一定程度上讲，是一个自然因素，我们国家历史文化的传承中没有这一块。在超世俗的结构性力量不存在的情况下，中国怎么办？西班牙有这么一个特点，所以我就来讲了。其他四点，我觉得其实哪一点都缺。要讲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觉得可能是执政力量。其实只要是和平转型，你就一定要承认既有的政治权力，承认既有的掌权力量，你不能否认它的存在。对社会来讲，你必须承认它，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它就在那里。对于一个政党来讲，你要想能够把握好，领导这个国家走向现代文明，就有一个自己怎么去主动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政治改革的主导权是把握在一个政党手里的，这个主导权理论上把握在你手里，但是你能不能把握好是一个很难的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你不能把握好，社会矛盾激化到最后，你想把握都把握不了了。如果讲哪个最关键，我觉得还是在执政党身上。我们现在就要更多地呼吁我们党思想理论的创新，党的思维方式的改变。你把思想空间打开了，理论创新有了一个清晰的思路来指导，很多问题是在实践当中摸索出化解之路来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讲最重要的，是这个问题。

**乔依德：**谁还有问题？或者有什么评论？如果大家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今天的沙龙就到这里结束了。大家再次以热烈的掌声，对蔡教授的演讲表示感谢。